



复旦文史专刊之五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西文文献中的 中国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复旦文史专刊之五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编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中华书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11

(复旦文史专刊)

ISBN 978 - 7 - 101 - 08853 - 3

I. 西… II. 复… III. 中国历史—史料 IV. K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3914 号

书 名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编 者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

丛 书 名 复旦文史专刊

责任编辑 胡 珂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插页 2 字数 406 千字

印 数 1-15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 08853 - 3

定 价 56.00 元

目 录

序	葛兆光(1)
---------	--------

自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	夏伯嘉(3)
从《大航海时代丛书》看日译耶稣会史及东西方关系史	
文献的基本特点	戚印平(17)
早期西文文献中的官话与方言	韩可龙(29)
西文史料与中国史研究	董少新(51)
中西合璧的手稿:《谟区查抄本》(<i>Boxer Codex</i>)初探	李毓中(67)
法国在华调查与“中国研究”	毛传慧(83)
荷法文献中的中国南方沿海地区	蔡香玉(105)
16 世纪葡萄牙海外文献中关于中国贸易的记载	张廷茂(121)
西班牙塞维利亚印地安斯档案馆收藏有关	
中菲贸易史料的概况	方真真(133)
18 世纪至 19 世纪前期西文文献中的对华贸易	范岱克(163)
“西文文献中的中国”研讨会实录	(193)

附录:16—18 世纪中国天主教史西文原始文献概览

.....	高华士编 董少新编译(269)
-------	-----------------

序

写这篇小序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钱锺书先生访问日本时，在京都大学演讲时用的一个比喻。他说，日本研究中国文化有世界公认的“卓越成就”，所以到日本讲学，是很胆大的举动，即使不必通身是胆，也得有斗大的胆。但面对日本研究中国的这些“卓越成就”，他又说，因为自己不懂日文，面对丰富的宝库，“就像一个既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的穷光棍，瞧着大保险箱，只好眼睁睁地发愣”。同样，我今天面对“欧洲文献中的中国”这样一个议题，也觉得自己好像那个穷光棍，面对一个丰富宝库，满心羡慕，但是讲不出什么名堂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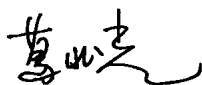
好在我虽然不像赵子龙通身有胆，也还是有一定的胆量，在这里，我仍然想斗胆讲一些外行感想。

几年以前，文史研究院刚成立的时候，我曾提出过一个问题，就是“研究中国，仅仅依靠中国的文献是否足够”？大家都知道，中国汉文文献很多很多，多到要用“汗牛充栋”、“浩瀚无边”这样的词来形容，所以，过去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常常只关注中国自己的资料，甚至有人还会反问，研究中国不是就得用中国史料吗？这话当然没错，不过，我总觉得，中国史料描述的中国，往往只是自我打量和自我想象，如果有一些来自异邦的观察和想象，是否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呢？就像有了镜子一样。我总说，镜子一面还不够，一面只能看到前面，要有多面镜子，所以，欧洲文献中有关中国的资料就格外重要，它不只是多提供了资料，还多提供了不同的观察立场、角度和观念。

中国学问的进展和更新，也许总和新资料的发掘有关，如果新的资料发现很多，往往学术进步就大。当然也有另一个问题，如果发现很多，却不能形成重写历史的契机，也不能推动学问的大进展。但是总的来说，新资料的发现总

是学术进步的第一步,这一点,前辈学者如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等早就说过了。回顾学术史我们看到,在中国学术尤其是文史之学中,新资料和新发现仍然在促进学术的变迁更新。20 世纪所谓“四大发现”中,甲骨文的发现刺激了上古史的重建;敦煌文书的发现刺激了中外文化史、宗教史和艺术史的进步,也使得考古、语言、写本成为显学;居延汉简以及后来各种简帛资料的发现使战国秦汉历史的研究重心发生变化;而大内档案则对宫廷政治、下层社会、明清制度的研究,起到了加速转向的作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学术的盛况,多多少少都是由新资料刺激的。傅斯年在建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曾说,拥有新资料、新工具,就等于是历史学的新进步。现在,东亚如日本、韩国、越南有关中国的历史文献在研究中的使用已经被广泛注意,我想,如果中国研究界能够再多运用一些来自欧洲文献中的中国资料,也许是促使学术进步的一个新途径。

我相信“欧洲文献”中,一定有着有关“中国”的宝藏。当然,正像我前面说的,如果你没有语言能力,面对这些用欧洲文字记载的资料,仍然是一个只好眼睁睁地看着保险箱发愣的穷光蛋。很高兴的是,这次会议邀请的各位学者,通晓各种语言,能够“探囊取物”,他们的经验和知识说明,今天仍然需要继承过去傅斯年、陈寅恪倡导的历史学加语言学的研究传统,真正有了便利的工具,就可以轻松地开锁、或者直接撬门,长驱直入地拿到宝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Guo Yizhi' (郭毅志), written in a cursive style.

自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中的中国：

文献分布与应用讨论

夏伯嘉(美国宾西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历史系)

明、清之际来华的欧洲人，可大致分为外交使节、商人与传教士三大类。清中叶以前，来华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便是西方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留下了丰富浩瀚的文献，对研究明清史提供了不少宝贵的史料。传教士籍属不同的修道会，来自不同的国家，文献书写的语言有拉丁文、葡、西、意、法、德、荷、波、捷等欧洲语言，广泛分布于众多的档案馆与图书馆。面对这庞大的文献资料库，笔者只能以有限的学识与研究经验，粗略地介绍中国天主教传教文献的分布情况与适用的方法和问题，有待各史学同仁补充、指正。

按入华的年代与人数，在明末至清中叶最有影响力的西方传教会首推耶稣会无疑。西班牙人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 1491—1556)创立的耶稣会(1540)是罗马天主教旧教在对抗新教宗教革命的挑战与在复兴教皇神权的运动中最有效的新力军。耶稣会的活动，主要在创办学校与传播圣道。创会之后，耶稣会发展奇速：1540年创会最初的十人，至1556年罗耀拉逝世之年已达一千人，1565年有三千五百人，1626年一万五千五百人，迄1749年约二万二千六百人的高峰^①。来华的耶稣会士，除了少数与澳门葡商在广州交易会短期逗留，最先进入内地学习中文、置业开教的是意大利籍会士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与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自利玛窦开创耶稣

^① 见拙作 *The World of Catholic Renewal 1540—1770*, 2nd revise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27, 32.

会在中国的传教事业,从明万历至清乾隆中叶教皇废禁耶稣会(1773),入华的耶稣会士约在四五百人之间,人数遥遥领先其他的传道会与18世纪在意大利与暹罗训练的中国神职人员。跟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海洋扩展,耶稣会士的足迹亦遍达欧、亚、美、非各大洲。与传统的修道会不一样,耶稣会是一个纪律严明,层层相属,由上至下,高度中央集权的组织。自罗耀拉以下各总会长,皆是靠着固定的书信往来去领导这个庞大的组织。故此,自罗明坚与利玛窦入华,一直与罗马总会保持联络,每年汇交报告。及耶稣会中国副省成立后,耶稣会传教区发展至中国多个行省,每年的报告先由个别传教士汇交副省长,然后,经过副省长编辑汇合后,再写成年报式(*litterae annuae*),分各道寄回罗马总会。随着耶稣会的扩张与新省区的成立,罗马总会档案中的文献大量增加。在1581与1654年间,耶稣会总部曾选择出版了各传教地的年报,后来因为经费欠缺而停止出版。除了这一套有系列出版的年报外,在中国的耶稣会士亦个别出版了某些年的年报,例如金尼阁于1615和162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年报。

耶稣会年报有一定的格式:首先报道中国的政局,跟着表列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士姓名与资料,接着汇报旧年度领洗入教的人数,各传教地的教务发展或遭受迫害的情况。在这一段内,通常年报记载了一些虔诚的,有教诲、启发性的事迹。例如教徒梦见圣母玛利亚显灵,或教友以圣水、圣事治病,使教外人皈依天主教等等。有些年报亦报道中国教民的教名与事迹。但是,年报中用的是教名,除非学者在中文文献找到相关的资料,单以西文文献确定中国教徒的身份非常困难。

耶稣会中国传教的年报主要收藏在罗马耶稣会历史档案馆(*Archivum Romanum Societatis Iesu*),日本—中国编号(Jap. Sin.)。其次,葡萄牙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Biblioteca da Ajuda*)亦收藏了耶稣会澳门档案的18世纪抄本,包括为数不少的年报。两档案馆收藏中国传教区的年报情况,请见附表1。耶稣会的中国传教区最初由日本省管辖,在1615年分开后才成立独立的中国副省。所以最早有关中国的文献皆在日本区的年报中^①。

中国传教区最早的年报是李玛诺(*Manuel Dias*, 1559—1639) 1598年3对开页简单的年报,简要报告了韶州与南昌的教务,并说利玛窦神父正准备上京。这些最早的年报的讯息,不超出罗明坚与利玛窦的书信和后者的《中国传

① 自德川幕府全面禁止天主教,1614年以后,耶稣会活动在日本渐渐绝迹。故此,1658年Goswin Nickel总会长将广东、广西省由中国副省转属日本省。从此,以澳门为中心的耶稣会日本省传教区包括广州、海南岛与安南。

教札记》。利氏 1610 年逝世后,耶稣会传教事业迅速发展,尤其在崇祯朝突飞猛进,为整个中国天主教历史中发展最快速的时代。自利氏至南明的耶稣会文献,只有一小部分已经出版。教务蓬勃发展反映在年报上,篇幅与内容大有充实,试举何大化(Antonio de Gouvea, 1592—1677)1636 年的年报为例。比起 1598 年 3 对开页的年报,1636 年的年报为 35 对开页,篇幅增长十二倍有奇,内容的目录如下:

- (一)中华帝国的政局
- (二)耶稣会中国副省的概况
- (三)北京的修会
- (四)北京的教徒
- (五)北京市郊的传教
- (六)有教诲性的事迹
- (七)南京的修会
- (八)南京神父们在郊区的传教
- (九)南直隶的上海县
- (十)神父在上海的传教
- (十一)浙江省城杭州的修会
- (十二)有教诲性的事迹
- (十三)绛州(山西)的修会
- (十四)绛州地区的传教
- (十五)陕西的修会
- (十六)河南的修会
- (十七)福建省城福州的修会
- (十八)福州地区的传教
- (十九)福建省建宁府的修会
- (二十)邵武的教徒
- (二十一)建阳县的教堂
- (二十二)福建省泉州的修会
- (二十三)福安县农村的传教
- (二十四)永春的传教
- (二十五)兴化府的传教
- (二十六)江西省建昌的修会

(二十七)江西省会南昌的修会^①

1636年的年报,对闽、赣的教务报道最详尽,其中大部分来自艾儒略的报道。

及李自成领导下的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北方政局大乱。在南方的耶稣会与长江以北的传教士失去联络,耶稣会中国副省遂分为南北两个部分,相应地,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也分为南北两份。在清廷与南明和农民军角逐的年代,耶稣会的年报与个别传教士的书信,记载了宝贵的史料,其中有三项可以补充传统中文文献的不足:

(一)意大利耶稣会士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i, 1582—1649)与福王朱由崧和唐王朱聿键素有交往。甲申事变,福王在南京即位,年号弘光,委任毕方济出使澳门求援。及南京失守,弘光帝亡,唐王在福州称帝,号隆武,继续委任毕方济周旋于闽、澳之间。弘光、隆武两帝,与隆武朝廷掌握兵权的郑芝龙(天主教徒)跟毕方济与澳门的关系,可见于罗马耶稣会历史档案——日本/中国123号与161号的文献。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亦有一小段节译^②。此外,耶稣会中国副省1651年的年报亦记载了清兵攻陷广州与绍武帝朱聿键的覆亡^③。

(二)永历朝廷与天主教。南明诸帝最后的皇帝朱由榔之宫廷中,有不少天主教徒,包括先已入教的司礼太监庞天寿与大学士瞿式耜和后来领洗的王皇太后(天启帝妃)、马皇太后(永历帝父之次妃)、王太后(永历帝正室)、与皇子慈炫。故此,在耶稣会文献中有不少关于永历朝廷的记载。耶稣会士瞿安德(Andreas Xavier Koffler, 1603—1652)与卜弥格(Michael-Pierre Boym, 1612—1659)活动于永历朝廷;后者于1650年赴澳门,转印度,赴欧洲,代表王皇太后与庞天寿出使罗马教廷,为南明抗清政权争取支援。这些事迹在早期中国天主教史研究中显赫一时,近年亦有学者专注,可是在国内南明史研究领域中很少被注意^④。卜弥格在欧洲的辗转和回程中国旅死越南的史迹,已有波

① Antonio de Gouvea, *Annua da Vice Provincia da China do Anno de 1636*, Biblioteca da Ajuda, Códice 49—V—11, fols. 521v—555v.

②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中华书局,1988年,页198—207。

③ 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 *Jesuitas na Ásia*, 49—IV—61, fols. 75—120.

④ 早期天主教历史的研究可见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近著见黄一农:《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台湾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九、十章。国内南明史的研究著作,可见顾诚:《南明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与张玉兴:《南明诸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

兰学者 Edward Kajdanski 用耶稣会文献为之立传，并有中文译本^①。

(三) 耶稣会士安文思 (Gabriel de Magalhães, 1610—1677) 和利类思 (Ludovicus Buglio, 1606—1682) 在成都传教，1643 年张献忠入川，二传教士被迫为大西朝天师，后遭猜疑，几被杀戮。1647 年清兵入川杀献忠，获二耶稣会士并解京，后获释。身在囹圄的安文思怀恨位职钦天监的同会会士汤若望 (Jea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最初不肯相救，被释放后发泄怨恨，屡次上书告发汤若望，并详细叙述在张献忠军中的种种经历，不失为明清易鼎之际的一项独特文献^②。

耶稣会士汤若望任职钦天监，历经明、顺、清三个政权，深得清世宗顺治帝的倚宠，俨然成为中国天主教的保教人。顺治帝崩，杨光先历狱起，汤若望几被处死。后因比利时耶稣会士南怀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精算日食，赢得康熙帝之信任，杨光先被罢官充军。由此耶稣会掌握钦天监百余有年，而北京京城遂成为天主教传教的中心点。耶稣会的文献亦因为历狱在 1662 年中断。除了一份 1665 年报告教案以外，年报要待 1675 年才重新流传。

康熙盛期亦是中国天主教的高峰时期。耶稣会年报自 1685 至 1697 基本上完整保留。可是，在中国的耶稣会遭到三件事情的困扰：第一个是 1660 年代，罗马教廷传信部开始逼迫葡萄牙王室在亚洲的保教权，派出宗座代牧出任亚洲各传教区的主教，并要求各传教会服从罗马代牧的命令。第二个是中国礼仪之争，经过耶稣会与托钵修会（道明会与方济各会）两度上书教廷，互相就礼仪而攻击，中国天主教传教士两部的矛盾已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派往中国的宗座代牧最初来自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礼仪之争中同情托钵修会，耶稣会逐渐被迫处于被动之地。第三个是法皇路易十四派遣五名精通数学的法国耶稣会士，于 1687 年经宁波到达北京，开启中、法外交之门。在中国耶稣会副省中享有保教权的葡籍传教士占多数而具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以葡籍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 为首的北京耶稣会士，排斥同会的法国会士。相应地，法籍耶稣会士亦拒绝服从中国副省，声言直属于法国省的耶稣会。白晋 (Joachim Bouvet, 1656—1730) 与张诚 (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两人跟徐日升多次冲突；耶稣会内讧，双方的告状不单寄往罗马总会长，事情又闹到康熙皇帝眼前，令康熙大为不快。

① [波]爱德华·卡伊丹斯基 (Edward Kajdanski) 著，张振辉译：《中国的使臣：卜弥格》，大象出版社，2001 年。

② 安文思的信件收藏于罗马耶稣会历史档案馆，大部分已发表于 Irene Pih, *Le Père Gabriel de Magalhães. Un jésuite portugais en Chine au XVIIe siècle* (Paris,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1979), pp. 253—348。

由于以上耶稣会中国传教区内部的发展,中、欧双方自17世纪末书信往来大量增加。各种传教士的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一年一度的年报渐失去其重要性。为了解决礼仪之争,教皇派遣多罗(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 1668—1710)大主教于1700年出使北京。怀着对耶稣会强烈敌意的多罗,在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引起康熙的不满,遂有1705年禁止中国人习天主教之令。中国的耶稣会在1698至1707年间的文献,绝大部分围绕着礼仪之争和多罗使团两个题目。此外,在罗马与耶稣会历史档案中亦保存不少有关葡、法耶稣会集团矛盾的文献。通过法国皇室的政治压力,耶稣会总会长迫不得已,准许法籍耶稣会士在中国成立独立的组织。又1693年在康熙治疗疟疾的过程中,法国耶稣会士献上金鸡纳。病愈后,康熙对几位法国神父大加赞赏,赐地筑堂^①。故此,自1703年后法国耶稣会士有自己独立的传教区,直接向罗马与巴黎报告,不需要服从葡属中国副省会长的命令。18世纪以降,耶稣会的文献,法文资料的分量和重要性日见增长。在巴黎的耶稣会,自1702年开始编辑出版来自全球法籍耶稣会传教士的书信(其中有来自中国的大量篇幅),迄1776年耶稣会解散之后,一共出版了34册^②。

礼仪之争前后的耶稣会文献有一个特点,它们记载了康熙皇朝宫廷内部的一些珍贵资料。康熙学习西洋科学、数学、音乐与医学,宠信耶稣会士。南怀仁、徐日升、张诚、白晋等屡次被召见诠释西学。宫中的耶稣会士多识满文,隶属内务府,与康熙有个人关系,像有些满人统治阶级中主子和包衣的密切关系。除了进献西药,掌管天文,耶稣会士又担当外交与翻译的任务。1689年谈判规划中俄边界的条约,就有徐日升与张诚积极参与。在礼仪之争决裂之先,耶稣会传教士甚至幻想康熙会领洗入教,让天主教成为中国的国教。虽然,耶稣会文献中对康熙帝宠信传教士的情况多夸大其词,可是对宫中皇室的生活与康熙性格的描述,不失可以弥补中方文献的空白。例如,以《起居注》与《实录》对比耶稣会文献,在中西外交与宫廷生活中,后者常常记载比较丰富。

法国耶稣会中国传教区成立以后,它的文献亦有一个特点。从法国派去中国的耶稣会士,很多人精通天文、数学与医术。因此,巴黎出版的《耶稣会书信集》有不少有关科学、植物学与药学的讯息。例如,宋君荣(Antoine Gaubil,

① 见董少新:《形神之间——早期西洋医学入华史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页222—223。

② P. Le Gobien et al., editors, *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par quelques missionnaires de la Compagnie de Jésus* (Paris: N. Le Clerc, 1702—1776).

1689—1759)的书信中,记载了大量的天文资料^①;而今天巴黎科学院与天文台图书馆中亦藏有可观的来自中国的法籍耶稣会士搜集的科学资料^②。

反观葡属耶稣会中国副省,在康、雍、乾三朝亦增进一批新力军。跟中国法属耶稣会不一样,中国副省一直以来包括来自各个欧洲天主教国家的传教士。当然,葡籍的传教士人数占优势,但是来自意大利、低地国家(今比利时)和德、奥等地的耶稣会士曾担当重要的传教角色。他们的书信,除了在罗马和里斯本外,现分布于欧洲各个图书馆与档案馆,以下试举在比利时与德国史料收藏的情况。

一、布京比利时国家档案(Archives Générales du Royanme)。在布鲁塞尔的国家档案编号《耶稣会档案:比利时法兰特省》872—915 与 1427 号的文献与中国传教有关。重要的文献包括高一志(Alfonso Vagnone, 1568/1569—1640)1619 年写给总会长有关 1616—1617 年南京教案的详细报告;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 1622—1693)、鲁日满(François Rougemont, 1624—1676)、南怀仁、安多(Antoine Thomas, 1644—1709)、Jean de Haynin(没有中文姓名)、卫方济(François Noël, 1651—1729)、王以仁(Pieter van Hamme, 1651—1727)的书信。以上各人,除了卫匡国皆为比利时籍耶稣会士,来信大部分为与在比利时同会会友的通讯。此外,1427 号收藏 1618 年,1619 年,1620 年和 1652—1654 年的年报。

二、布京皇家图书馆手稿部编号 B. R. 6828—6869,收藏比利时籍耶稣会传教士自各地寄回本国的书信,包括与中国有关的文献。

三、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档案馆编号 Jesuita 588 至 592 号为德籍耶稣会士自中国寄回本国的书信。继汤若望之后,德、奥籍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曾扮演重要的角色,戴进贤(Ignace Kögler, 1680—1746)、纪理安(Kilian Stumpf, 1655—1720)、魏继晋(Florian Joseph Bahr, 1706—1771)、鲍友管(Anton Gogeisl, 1701—1771)、庞嘉宾(Kaspar Castner, 1655—1709)的书信,一部分在 18 世纪已经出版。德、奥耶稣会模仿法国会士出版的书信集,于 1726 至 1758 年间出版了五部 36 册的书信集,书名 *Weltbotte*,全名为 *Allerhand so lehrs-als geistreiche Brief/Schriefften und Reisbeschreibungen/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aus beyden Indien und andern über Meer gelegenen*

① 宋君荣书信集见 Antoine Gaubil, *Correspondance de Pékin, 1722—1759*. Editor, Renée Simon, Geneva: Librairie Droz, 1970.

② 见 Florence C. Hsia, *Sojourners in a Strange Land. Jesuits and their scientific mission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Ländern ... theils aus handschriftlichen Urkunden/ theils aus denen frantzösischen Lettres édifiantes verteutscht und zusammen getragen.

四、德国 Dillingen 富家 (Fugger) 档案馆。富家家族为 16 世纪在 Augsburg 崛起的大资本家与银行家。这个私人档案馆收藏了 18 世纪中叶一个富家女公爵和在北京耶稣会士魏继晋的通信。书信已发表^①。

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对耶稣会文献的讨论,篇幅亦较长。当然,明清之际,在中国传教的还有道明、方济各、奥古斯丁三个托钵修会、巴黎外方传教会、罗马传信部派遣的传教士,以及另外人数较少的修道会。它们的传教历史与文献流传,本文只能在此略述一、二。

道明会在中国传教,集中在浙江、福建两地,而尤以闽东为主。在明末初次入华的道明会士来自西班牙统治下的吕宋,除了大部分为西班牙人外,亦有少数意籍与从福建和菲律宾的中国教徒中招募的神职人员。道明会的文献散布在马尼拉、罗马和西班牙的 Avila,有一部分已经出版^②。此外,学者利用道明会文献,颇有收获:意大利学者梅欧金与中国学者张先清研究明、清福安的天主教,皆为优秀之作^③。

方济各会(或方济会)在中国传教不比道明会逊色,在人数上仅次于耶稣会^④。同样来自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的方济各会士,以本国人士占绝大多数,其中亦有意籍神父,但是没有训练中国籍的神职人员。方济各会文献的整理出版,在篇幅上颇为可观,迄今已有十一册(十六本)的《中国方济各会志》。可

① 见拙著 *Noble Patronage and Jesuit Missions: Maria Theresia von Fugger-Wellenburg (1690—1762) and Jesuit Missioaries in China and Vietnam*. Rome: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6 = *Monumenta Historica Societatis Iesu*, nova series vol. 2.

② José Maria González. *Historia de las misiones dominicanas de China*. 5vols. Madrid: Juan Bravo, 1955—1967 and *Misiones dominicanas en China (1700—1750)*. 2 vols. Madrid: Consejo Superior de Investigaciones Científicas, 1952—1958.

③ 张先清:《官府、宗族与天主教:17—19 世纪福安乡村教会的历史叙事》,中华书局,2009 年; Eugenio Menegon. *Ancestors, Virgins, and Friars. Christianity as a Local Relig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④ 下列耶稣会、道明会、与方济各会传教士的比较数目来自 Nicolas Standaert (ed.),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Leiden, Boston and Köln: Brill, 2001, pp. 307—308:

年代	1637	1690	1700	1706
耶稣会	28	33	67	72
道明会	4	6	12	10
方济各会	6	15	21	24

惜在学术研究中,除了中国学者崔维孝曾系统研究此项文献外,方济各会的史料尚待学者多开发^①。

巴黎外方传教会来华时间在 17 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前传教士人士总共约四十人。虽然人数不多,外方传教会在中国天主教史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罗马派遣前往中国教区的第一名主牧就是外方传教会创办人之一的陆方济(François Pallu, 1626—1684)。在中国礼仪之争中,陆方济与他的继承人同会的颜当(Charles Maigrot, 1652—1730),皆是站在激烈反对儒家礼节、耶稣会传教策略和葡萄牙保教权的一边的。在巴黎的外方传教会的档案,收藏非常丰富,但是清中叶的部分尚未完善处理;18 世纪的书信,除了主要的法文文献有题要,尚有葡、意为数不少的书信尚未整理。虽然,外方传教会网址上发表了有关中国传教的报告,但最早的源自清同治期。早在 1920 年,外方传教会士 Adrien Launay 曾以档案资料出版了一部《中国传教史》,可供学者初步参考。中国学者对外方传教会的研究,有耿昇、韦羽等人^②。已经出版的史料,最重要的是李安德(Andreas Ly, 1692/1693—1774)的日记。籍贯陕西城固的李安德于 1710 至 1722 年间在暹罗外方传教会的神学院攻读。升任神父后回国,先服职福建,后调转四川。他以拉丁文书写的日记记载了 1742 至 1763 年间在成都的见闻。作为历史文献,他的日记对经济、社会、与政治史亦是很珍贵的资料。美国学者 Robert Entenmann 曾以此文献讨论平定金川之役^③。

结 论

以上讨论明末至清中叶天主教西文文献,因篇幅与个人研究的局限,只能简要略述其大概的形成与分布情况。下面试举天主教西文文献对明、清史研究的可用之处,作为本文之总结。

一,天主教西文文献对中国天主教史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近年学者多有发掘阅读有关中国天主教史的中文文献,大力扩充了研究成果。但是,这个学术领域之中,西文文献所占的位置,仍占绝大多数。很多题目,没有西文文献,是很难以入手的。

① 崔维孝:《明清之际西班牙方济会在华传教研究(1579—1732)》,中华书局,2006 年。Sinica Franciscana, vols. I-XI(Florence/Rome/Madrid, 1933—2008)。

② Adrien Launay, *Histoire des missions de Chine*. 4 vols. in 7, Paris: MEP, 2002 reprint. 耿昇《试论巴黎外方传教会的在华活动》与韦羽《清前期德国传教士穆天尺(Jean Müllener)在华活动述略》,收入《明清时期的中国与西班牙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理工学院出版,2009 年。

③ Robert Entenmann, “Andreas Ly on the First Jinchuan War In Western Sichuan (1747—1749)”, *Sino-Western Cultural Relations Journal* 19(1997), pp. 6—21.

二,传教士在中国讲道宣教,自然对中国流传的宗教高度注意。利玛窦的《中国札记》已向西方世界介绍了儒、道、佛三家,并简略叙述在中国的伊斯兰和犹太教。耶稣会士龙华民是第一个与回教领导对话的西方传教士^①。《中国方济各会志》亦记载了传教士访问清真寺,咨询有关中国礼仪与伊斯兰矛盾的地方。此外,西方文献记载了中国民间宗教的信仰与礼仪,包括被官方打击的秘密宗教。中国传统史料多出于读书人之笔,反映了士大夫、儒生对民间宗教的偏见与鄙视。西文文献弥补了这个空白,对研究中国宗教与文化很有价值。

三,西文文献对明、清的政治史有可用之处。本文已提及明清易鼎、南明抗清、康熙宫廷、外交使节几个显眼的题目,在此不重复。

四,在经济史方面,传教士的文献有零星物价、投资、置业、汇款的记载;更加可贵的是清初比利时耶稣会士鲁日满(François Rougemont, 1624—1676)在常熟的帐簿(1674—1676年)^②。

五,此外,在明、清的技术史、科学史、医学史、美术史、语言学与音乐史的领域,学者已经确认天主教西文文献的重要性。

明、清之际中国与西方交流、对话,是站在一个平等的地位。天主教西文文献反映了这一个既复杂而又有长远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

表 1 耶稣会中国副省年报现存情况

年 份	罗马耶稣会历史档案馆
	编 号
1597/98	Jap-Sin53
1604	Jap-Sin55
1601/1611	Jap-Sin57
1595-1616	Jap-Sin113
1617-1625	Jap-Sin114
1625—1637	Jap-Sin115 I - II
1614—1734	Jap-Sin116
1640	Jap-Sin116a
1613—1770	Jap-Sin117

① 见拙著:《天主教与明末社会:崇祯朝龙华民山东传教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2009年第2期,页51—67。

② Noel Golvers, Francois de Rougement, S. J., *Missionary in Ch' ang-Shu (Chiang-nan): A Study of the Account Book (1674—1676) and the Elogiom*, Leuven: Leuven University Press, 1999.

续 表

	罗马耶稣会历史档案馆
年 份	编 号
1641—1642	Jap-Sin118
1643	Jap-Sin119
1669—1670	Jap-Sin120
1601—1639	Jap-Sin121
1639—1670	Jap-Sin122—126
	里斯本阿儒达图书馆 <i>Jesuitas na Ásia</i> 档号
年 份	编号/页数
1618	49—V—5, fols. 232v—264v
1621	49—V—5, fols. 309—335v
	49—V—7, fols. 283—305v
1622	49—V—7, fols. 361—372
1623	49—V—6, fols. 105—133v
1624	49—V—6, fols. 158v—189
	49—V—7, fols. 465—531v
1625	49—V—6, fols. 211—238
	49—V—8, fols. 23—48v
1626	49—V—6, fols. 308—328v
	49—V—8, fols. 77—117
1627	49—V—6, fols. 465—496v
	49—V—8, fols. 171—203
1628	49—V—6, fols. 584—604v
	49—V—8, fols. 355—374; 543—561
1629	49—V—8, fols. 581—591v; 595—626
1630	49—V—8, fols. 667—683v; 712v—730
	49—V—9, fols. 12v—31v
1631	49—V—10, fols. 1—32v; 36—73
1632	49—V—13, fols. 76—125
1633	49—V—11, fols. 1—92
1634	49—V—10, fols. 374—426; 432—481v; 494—541
1635	49—V—11, fols. 195—239; 279—302; 311—365v
1636	49—V—11, fols. 521v—554v